

当代中国 70 年学术史的一面镜子

何中华

由王学典教授主编的《〈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术编年(1951-2021)》(郭震旦编撰(以下简称编写))和《〈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术七十年(1951-2021)》(陈峰、李梅、邹晓东著(以下简称本七十年))两书,在《文史哲》创刊 70 周年之际,由山东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通过这两本书,我们得以窥见《文史哲》自创刊以来 70 年历程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这些成果对于推动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此论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当然是多维度的,但至少可以被理解为:历史总是在后人的叙事(包括描述、解释和评价)中被不断地建构起来的,它是在这种叙事中朝向未来开放着的而非完成的。就此而言,历史并非完成于它自身,而是完成于人们对它所作的能动建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包含的两层意思,即已发生的事和对它的叙述,是无法完全剥离开来的。其实,对于思想史来说,同样也不例外。历史叙事乃是一个民族达成自我意识的基础,也是这种自我意识本身。人文学术折射着一个民族的历史存在,是这种历史存在的一种反思形式。思想是历史之镜。作为一种对于时代的反思性把握,人文学术研究总是折射着它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历史变迁及其深层脉络。如此一来,对学术史本身所作的记录、叙述和解读,就有了人的存在的本体论含义,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这也正是思想史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文史哲》杂志不仅能能动地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年人文学术发展的历史建构,同时又构成这一历史进程本身的见证者和独特象征。应该说,对其自身历史的记录、刻画和诠释,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正是在这个方面,《编年》和《七十年》两书作出了重要贡献。

《编年》一书把自 1951 年创刊号起迄至 2021 年止的 70 年的杂志精华提炼出来,按照年代顺序或详或略、提纲挈领地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一册在手,即可使《文史哲》发表的代表性作品之内容梗概一览无余。诚如已故余英时先生当年在为《文史哲》题词中说的,“一展卷数十年人文思潮之起伏尽收眼底”。我们从中既足以读出这些论文所贡献的真知灼见,也能够领略作者们的专业造诣和学术底蕴,还可以体会这背后所隐含的编者的眼界和良苦用心,以至鸟瞰杂志刊载文章的学术焦点之变迁轨迹。不难发现,伴随国家的步履一路走来,《文史哲》既见证了世界和中国社会的历史巨变,也以学术的方式参与了时代的积极对话,留下了一部永远值得回眸的学术史记录。可以说,无论是对于共和国还是《文史哲》而言,这 70 年的历史都是一段既沧桑而又辉煌的岁月。

《编年》在每一年度的篇首,都先简要交代这一年发生的关乎国家、学界和《文史哲》本身的大事,以便为读者理解本年度编辑和发表的成果提供一种方位感和历史感。而后又从所有发表的作品中精心挑选,优中选优,把那些真正有代表性的以至带有标志性的篇章凸显出来,纳入记载、介绍、点评的范围。当然,任何选择都难以尽善尽美,无法完全避免遗珠之憾;但应该说,入围的这些成果在总体上是值得信赖的,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另外,《文史哲》做的两件大事,即举办“人文高端论坛”(始于 2008 年)和评选并发布“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年度十大热点”(始于 2015 年,与《中华读书报》合作),也构成其整个历史的一个有机部分。再者,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创办《文史哲》英文版(2014 年创刊并海外发行),这足以显示出编者的文化开放姿态和眼光。可以说,在大陆综合性人文期刊中,此举为“东学西渐”开了风气之先,顺应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大势。在这一点上,其意义甚至不亚于《文史哲》中文版的创刊。所有这些工作,都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编稿和发稿的狭隘范畴,对于拓展杂志的视野和扩大其影响力是不可或缺和功不可没

的。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过去那种认为编者完全是被动角色的刻板印象,使刊物在同国内外学界的积极互动交流中,得以在一个更为宏阔而高远的平台上运行。所有这些,也都在《编年》中有其详实的记录和再现。

《编年》看似流水账般平淡无奇,但其并非有文必录,而是有所择取。取详略之间,自然体现出选家的眼光。秉笔直书式的史笔,乃是良史的内在要求。对于一本人文学术杂志的编年体著作来说,同样应该体现这种要求。因为广义地说,《编年》不仅是在为《文史哲》本身立传,也是在为共和国 70 年人文学术史立传。就这一点来说,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一本杂志及其历史的范畴。

如果说《编年》系对《文史哲》创刊以来 70 年发表的成果按时间顺序所作的一次萃取和浓缩,一次巡礼和检阅,那么,《七十年》则是以此为基础所作的主题化、问题化意义上的反刍、解读和升华。前者是过去时和完成时,后者则更带有现在时和将来时的特点,从而是向未来敞开着的,因为它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并以此期待着可能的回应和答案。

《七十年》一书,共分为上中下三编,分别是“从民国学术到共和国学术:《文史哲》与新中国人文学术大转型”,“枯木逢春:《文史哲》与中国古典学术的复兴”,“重返本土:《文史哲》与 21 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气候变迁”。这一谱系,既是《文史哲》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三个发展阶段,也是在逻辑上环环相扣的深化和展开。这一节奏同共和国的历史脉络相吻合,从而以学术的方式折射着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文化步履。《七十年》的三编为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个“三部曲”式的刻画,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的和本土化的三种各有侧重的叙事范式。在人文学术研究领域,呈现出来的常态往往是,问题还是那个“老”问题,但提问方式以及回答方式和可能的答案却取决于我们的“此在”性了。正是在这种历史的展开中,学术史不再是一种仅供人们“解剖”的“死”的外在对象,而是我们参与其中的鲜活的建构过程。

诚如《七十年》所言,“对于新中国人文学术古典学研究来说,《文史哲》的创刊可以视为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中国选择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本身,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实践的结果。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甫一成立,马克思主义就必然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这决定了旧中国所留下下来的学术遗产,都必须被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叙事范式之中加以重新估价,要么放弃自己存在的权利,要么为自己的存在作出辩护。以史学界长期以来就在进行的“五朵金花”的讨论为例。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文史哲》创刊不久就开始深度介入这方面的讨论,大胆地发表有关争鸣文章,引发了大规模的反响,其影响甚巨,极大地促进了相关探讨的深化和拓展,为此作出了突出贡献。“五朵金花”的讨论,表面看似是一个“认识老中国”的问题,实则是一个“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亦即如何为中国革命和中国道路的合法性提供学理上的依据,它直接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普适性的估价和对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抉择。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使现代化重新被提上日程。它为人文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现代性叙事范式主导下的人文学术研究,经历了一次内部的转型,即由思想到学术的转向和过渡。为现代性的合法性作出辩护,构成“启蒙话语”的历史任务,它表现为一种由“思想”主导的时代精神。当这个问题解决之后,现代性的学术规训便凸显出来,并在在人文学术研究中取得了支配地位,成为现代化叙事范式的主潮。从这个意义上说,由思想到学术的转向并非一种断裂,而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在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古典学术经由现代性的“过滤”和“反刍”,被开辟出新的意蕴,为现

代化的来临准备了文化氛围和条件。这一时期,《文史哲》组织并刊发的“文化史研究笔谈”“魏晋玄学笔谈”,在某种意义上引领并伴随了 20 世纪 80 年代国内“文化热”的浪潮。整个 80 年代,新时期人文学术领域可谓是充满骚动和激荡,迸发出来的激情和思想张力,堪与“五四”时代相媲美。

当激情冷却之后,人文学术研究走向那种追求价值中立的、冷静客观的“小叙事”。大致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随着后现代主义所带来的对“元叙事”的不信任,随着西学在中国传播的日益深化,特别是中国学者对西方现代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掌握日趋娴熟,现代性规训越来越成为一种支配的力量。在现代性语境中,对于分科治学在人文学术研究中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人们鲜有批判性的反省姿态。海德格尔指出:“各门科学千差万别。它们探讨对象的方式根本不同。这许多支离破碎的学科,在今天只是被各大学科系的技术组织维系在一起,并且只是靠各学科的实际应用目的而保持其意义。反之,各门科学的根柢在其本质深处则已经死亡了。”这不仅表现在自然科学领域,也同样表现在人文学术领域。鉴于学科视野的隔膜造成的支离,海德格尔强调:在我们这个时代,“知识产生了,思却消失了”。这种吊诡正是现代性语境中的知识论规训带来的必然后果。海德格尔认为“科学不思想”。对于科学本身而言,“不思想”并非其弱点,而是它的天职;但对于哲学及整个人文学术来说,“不思想”就是失职了。

多年来,《文史哲》在编辑实践中,为打破学科壁垒所作的努力及其取得的经验和成效,值得学界肯定和赞赏。《庄子·天下篇》有云:“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如此一来,“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这正是荀子所批评的“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当然,古人有古人的问题,今人有今人的问题,但历史往往会在某个关节点上出现惊人的相似。不同学科的分工本身,既是学术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其陷入异化的开始。这是富有讽刺意味的。《文史哲》的旨趣是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按学科划定畛域。之所以注重求其“通”而避免“隔”,说到底乃是源于对中国古典学术本身所固有特质的肯认和正视。中国古代表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划分,而是文、史、哲难分彼此,科学、技术、艺术一体化。今天所谓的文学、史学、哲学,若追溯到先秦时期,其经典都是那些著作。这种聚焦本身,就足以表明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何其悠久而古老。

中国古典学术本身具有高度的综合性,这一突出特征决定了致力于对古典学术作出深度发掘和诠释的《文史哲》,必然选择高度贯通的视野和立场。另外,针对人文学术受到西学范畴的深刻影响,要消弥这一局限,就不能不作出某种积极的矫正,有时甚至不惜矫枉过正。这些努力,都共同指向了对现代学科范式之局限性的克服和超越。有鉴于此,《文史哲》致力于编发那些专业期刊“不好发、不便发,感到比较棘手、学科归属感不强的稿子”。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也是学术发展的一种常态。当学术的专门化达到极致之时,就愈加需要综合的工夫,正所谓“物极必反”。倘若“往而不返”,就有可能陷于偏颇而难以自拔。在专与博、分与合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乃是学术健康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学术研究走向健全的内在要求。“文史哲”的象征意味在于,它并不是三个学科的“凑合”,而是代表着人文学科不同视野的内在会通,它们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实质性地嵌入同一个“问题域”,进而展开平等对话、视野交融、优势互补,以期得到意义的不断生成。因此,《文史哲》致力于追求“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拒绝把思想同学术掰为两截的偏颇。

把古典文本“主题化”,从而“激活”其潜在的生命力,诱

发出意义的新的可能性,以应答时代的“质询”,这一取向成为《文史哲》古典学研究成果的一种偏好。就此而言,古典学术的研究,未必一定是那种“冬烘式”的“钻故纸堆”,亦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着立足于当代人的“此在”性的鲜明的“期待视野”,从而能够使古典思想在当下“活起来”,真正影响并融入今天人们的鲜活观念和行为之中。

“学术本土化”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一个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主性时代的来临。它并不是一个防御性的口号,而是中国学术研究日益走向自信的表现。它的提出,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语境中实现的。由现代化叙事范式向本土化叙事范式的转变,其历史语境是中国文化自主性的确立和中国的历史性崛起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学术本土化”是以肯认“中国问题”的个案性为基本旨趣的。“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中国话语”“中国立场”“中国视角”的独特性,日益得到学术界的正视和尊重。拿王学典教授的话说,就是要“把中国‘中国化’”,以颠覆人文学术层面上的西方话语霸权。美国汉学家柯文曾提出“中国中心观”,试图以此来克服费正清学派所建立的“冲击—回应”模式中残留的“欧洲中心论”的无意识(因为该模式下的中国依旧是一个受动角色),这无疑是有的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因为它毕竟在研究的立足点和视角选择上,实现了一次向中国本身复归的迁移。只有“回到事情本身”,才有可能使历史(包括思想史)以其本真性的状态“现身”。

由“西方中心观”到“中国中心观”的过渡,既是我们实现由宾格向主格的角色转变的反映,也是进一步促成这种转变的条件。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本土化问题的提出,也是补偏救弊的需要。随着新一轮“西学东渐”的涌起,特别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日趋深化,中国人文学术研究也存在着被西方范式“格式化”的问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中国特质,消解了中国问题,无视了中国经验。无论对于中国实际抑或对于中国学术,这都是是一种致命的妨碍。更深刻的问题在于,自我殖民化情结造成了中国学者自主性的丢失。它使得我们不仅对现代性缺乏足够的批判性反思能力,而且对“认识老中国”也缺乏“温情与敬意的了解”之态度。

“学术本土化”范式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学术自主性的自觉确立。从总体上说,它意味着中国学者开始把重心从逐译、绍介、模仿、凭借之类广义上的“高级学术报道”,逐步转移到以主格的身份处理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文本和中国问题。这是我们重获文化自信的表现,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这一历史拐点在人文学术领域的客观要求。总之,正如有学者所言,我们正在走出学术研究的“学徒期”。在这一背景下,“本土化”的诉求就不可避免地被提上学术研究的日程。这可以通过《文史哲》开设的一些栏目体现出来,例如“疑古与释古”“重估儒学价值”“公德私德之辨”“中国社会形态问题”“贤能政治问题”“儒学与自由主义对话”等等。

表面看来,《编年》和《七十年》两书,似乎是在为《文史哲》自身立传;其实广义地说,这也是在为共和国 70 年的学术史立传。因为在一定意义上,《文史哲》70 载的风雨历程,既是共和国学术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及其嬗变的一个“全息元”。我们有理由说,《文史哲》没有辜负共和国波澜壮阔、起伏跌宕的 70 年历史,它以其特有的学术方式参与并反映了这个时代。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文史哲》的历史本身从一个侧面折射着共和国的心灵史,浓缩着时代精神的精华,积淀着当代中国社会的丰富人文内涵。作为所有这一切的一个厚重缩影,《编年》和《七十年》两书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文学术图鉴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系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文史哲》何以一出场便创造刊物史的奇迹

——评《〈文史哲〉与共和国人文学术的初创(1951-1966)》

王舒琳

回首共和国的办刊史,已是七十余载。作为“共和国学术期刊的长子”,《文史哲》杂志自1951年5月1日创立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走过了筚路蓝缕的七十年,并成为中国人文学术的佼佼者,在海内外享有声誉。2021年5月9日,值《文史哲》创刊七十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肯定“《文史哲》创刊7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几代编辑人员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在弘扬中华文明、繁荣学术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鼓励《文史哲》及全国期刊界“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这封回信向中国人文社科界提出了办新时代高品质学术期刊的殷切期望。

为庆祝《文史哲》70年华诞,现任主编王学典主持编纂《文史哲》与共和国人文学术七十年书系。2021年7月,丛书系列之一的《〈文史哲〉与共和国人文学术的初创(1951-1966)》(陈峰、董彩云著)重磅推出。谈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史哲》,人们不禁慨叹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地处非政治中心、学术中心的地方性刊物,缘何能够一度占据全国学术中心,铸就山东大学文科的辉煌时代,乃至成为民国学术向共和国学术嬗递的重要引领者。“本书在回望《文史哲》参与和推动全国性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五朵金花’学术大讨论,新话语、新视野下的中国文学革命的历史场景,以及再现《文史哲》与共和国初期学术转型的波澜壮阔之中就给出了答案。”

《文史哲》是共和国学术期刊的急先锋。

1949年,随着新政权的建立,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政治方面发生巨变,意味着塑造相应的学术形态成为必然,这昭示着新的学术革命即将拉开帷幕。然而,人文学术界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除1949年创刊的《新建设》《学习》和1951年诞生的《新史学通讯》等杂志之外,全国的学术刊物寥寥可数。学术期刊是学术活动的载体、学术交流的园地、学术连接的纽带,直接关系到学术发展的兴衰。要想迎接学术革命的到来,形成学术活跃的局面,开辟新的学术阵地迫在眉睫。时任山东大学校长的华岗以其敏锐的嗅觉捕捉到了这一学术动向。1951年5月,在他的大力召集之下,在全校的文史学科带头人共同商讨之后,《文史哲》应运而生。华岗本人出任杂志社社长,副校长陆侃如和文学院院长吴富恒为副社长,历史系主任杨向奎则担任主编。得益于华岗的胆识与魄力,《文史哲》在中华大地诞生,开启了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的先河。必须提及的是,起初被称为“全国无人敢办的同人刊物”的《文史哲》之所以能够开花结果,离不开山东大学的鼎力支持。山东大学植根于山东这片红色热土,历来富有革命传统。加之1951年3月与华东大学这所专为山东解放区培养急需党政干部而创办的政治大学合并,革命氛围变得愈加浓厚。一定程度来说,《文史哲》在新旧学术演变中充当排头兵,正是山东大学红色基因的传承与延续。

《文史哲》是新旧学术转型的先行者。据吴富恒回忆,华岗办刊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要通过《文史哲》打破旧有的、单一的学术模式,建立起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

新的学术范式。基于这样的定位,华岗着手《文史哲》的建设工作。一方面,由于曾经长期奋战在宣传工作一线,他深知理论传播对于塑造学术形态的重要性。所以,他几乎倾注了所有热情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落实工作,不仅亲自向全校师生开设专门课程讲解马克思主义,而且鼓励山大文科教师运用马克思主义新观点来从事科研工作。很快,山大大校内就培植出一批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学术研究,推崇唯物史观、批判唯心史观的学者。这些学者常将颇有新意的稿件投给《文史哲》,这使得《文史哲》成为新学术的家园。另一方面,华岗又是颇有谋略的革命家。俗话说:有破才有立。为了树立马克思主义学术范式,他积极推动了批判实验主义的学术运动。一个典型的事例是,1955年《文史哲》发动了有计划有组织的胡适批判运动,成为整个20世纪五十年代“批胡”的主阵地。批判胡适的目的就是清算“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学术领域内的领导地位。虽然政治批判和学术批判杂糅在一起的利弊还难以评估,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史哲》确实矗立在了学术洪流的潮头,助推“全国性的胡适批判运动”的确促进了新旧学术的转型。

《文史哲》是国内一流学者的汇聚地。华岗不只是饱含理想的革命家,还是拥有学术抱负的学者,这点从他即使行政事务繁重,仍然亲力亲为《文史哲》的撰稿、审稿等可见一斑。他在《文史哲》方面均有涉足,最有建树的是中国革命史研究,本身就是一流的学者。同时,山东大学还拥有文学、史学、哲学领域的一批领军人物。中文系冯沅君、陆侃如、高

亨、萧涤非为代表,历史系借新成立之机,吸引了大量颇有学术名气的学者。比如,除了以杨向奎、童书业、黄云眉、张维华、郑鹤声、王仲莘、赵偃生、陈同燮为首的“八马同槽”外,还有吴大琨、许思园、华山、丁山、卢振华、莫东寅、袁寿椿、韩连琪、孙思白、蒋捷夫等。他们的研究领域覆盖了中国古代史、近代史、思想史、农民战争史等,形成了一个有机的历史研究群落,使得山大历史系声名鹊起。这些学者大部分都是外来的,或是向往山大兼容并包的办学风格,或是因院系调整合并而调入,当他们来到山大以后,大都选择进入《文史哲》编委会,既是优质稿件的提供者,又常常不计报酬做很多琐碎的工作,从组稿到审稿、校对到印刷,再到刊物发行。有这么多学术名流保驾护航,不难想象《文史哲》繁花似锦的场面。

《文史哲》是学术薪火的传承者。虽然《文史哲》在弘扬新学术方面不遗余力,但是出于尊重学术发展的规律,华岗倡导学术自由和争论。拿20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来说,《文史哲》的得力干将杨向奎、童书业,以及华岗本人都持“西周封建论”。这使得怀有不同看法的人疑虑这场学术大讨论能否在《文史哲》开展起来。华岗总是鼓励持不同意见的人写文章的做法很快破除了这种看法。《文史哲》积极践行“百家争鸣”的方针,刊载了不少战国封建论、魏晋封建论的文章,成为“金花”绚丽绽放之地。不仅如此,《文史哲》还十分重视发扬学术民主。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国情,共和国学术取代民国学术犹如一场疾风骤雨,使得旧有学术被迅猛洗刷。为了避免学术的一元化,《文史哲》始终为“旧学

术”留有一席之地,不仅将“旧学者”如杨向奎、王仲莘等收入麾下,而且不排除考察学者的文章。譬如,《文史哲》的创刊号上刊登了郑鹤声《天王洪秀全状貌考》,该文对洪秀全的样貌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具有典型的考据学特色。此外,《文史哲》在“延揽大学者”的同时,还乐于“扶植小人物”。华岗规定,《文史哲》每期尽可能推出一个新作者,每期至少要有一篇论述现实的文章。20世纪八十年代成名的学者如李泽厚、庞朴、李希凡、韦森等等,都曾受到过《文史哲》的“提携”,《文史哲》曾刊发他们的处女作、成名作或代表作。正是由于具备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和气度,《文史哲》才能发挥留存中华学术遗产、赓续中华文化传统、储备优秀学术人才的作用。

无疑,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史哲》创造了新中国刊物史上的奇迹,奠定了《文史哲》在中国人文学术界“极具影响力”的地位。国学大师季羡林曾说:“全国有关人文社会科学的杂志为数极多,但真正享有盛誉者颇不多见,山大《文史哲》系其中之一。”可以说,《文史哲》是共和国学术史的一面旗帜,是人文社科领域总结办刊经验得失的范本。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大使命。其中,人文学术期刊的作用至关重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期待“老牌学报”《文史哲》延续优良传统,践行新时代办刊精神,为弘扬中华学风、昌明中华学术、传播中华文明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中国地质大学讲师)

助理编辑:董宇 责编:王巍

地址:济南市山大南路27号明德楼A区420房间 邮政编码:250100 中心校区电话:88369929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3700004000187 印刷:淄博报达印务有限公司

投稿邮箱:wangwei1111@sdu.edu.cn